

试论秦始皇陵园选址的相关问题

朱学文

(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 陕西 西安市 710600)

关键词: 秦始皇陵园 选址 研究

KEY WORDS Emperor Q in Sh Huang's Mausoleum Selection of location Research

ABSTRACT The site location of Emperor Q in Sh Huang's Mausoleum was synthetically influenced by the following factors: the tradition of ritual system among the Qin people; the eastward expedition strategy; the prosperity of Qin state; the custom of luxury funerals; the 'xiangbang' (regime prime minister) Lv Buwei's ideology; and the preliminary theories of 'feng shui' (风水). The ritual system and development of Qin state already set up an eastward trajectory of the Mausoleum location. The flourishing of Qin state and prevalence of luxury funerals might have played a significant role in triggering the independence from the previous Mausoleum area in Zhijiang. In the end, the specific location was probably an integrated result of above mentioned factor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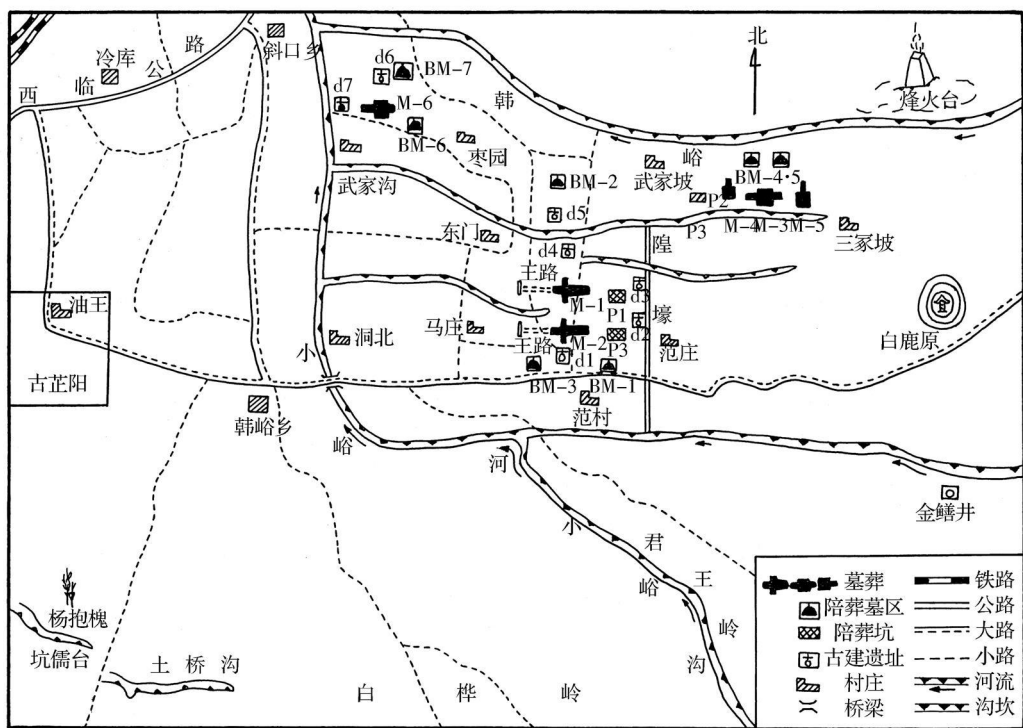
商周时期,人死后,“厚衣之以薪,藏之中野,不封不树。后世圣人易之以棺槨……。”^[1]《礼记·檀弓》记载:“古也,墓而不坟。”《易·系辞》“古之葬者……不封不树。”^[2]春秋战国时期,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的思想观念逐渐发生了变化,葬俗葬仪也在发生着变化。特别是一些君王、达官显贵为了显示自己的权力与地位,为了让后人永远地缅怀自己,开始在自己的墓上修筑坟丘,种植树木。《周礼·冢人》贾公彦疏:“案春秋纬曰:天子坟高三仞,树以松;诸侯半之,树以柏;大夫八尺,树以药草;士四尺,树以槐;庶人无坟,树下杨柳。”公元前335年,“肃侯元年,夺晋君端氏,徙处屯留。二年,与魏惠王遇於阴晋。……十五年,起寿陵。”^[3]这是历史上君王坟墓称陵的最早记载,也是活着的君王起建“寿陵”的最早记载^[4]。秦国从秦惠文王开始国君的称谓由“公”改称为“王”。同时他的坟墓也开始称“陵”。“惠文王享国二十七年。葬公陵。”^[5]后来随着厚葬风习的盛行,国君坟墓的封土越建越大,植树的数量愈来愈多。

秦王嬴政承袭先王遗风,即位初便开始修建陵墓。营建陵园是一个庄严、神圣的事情,陵园选址是陵园营建的前提和基础,是营建陵园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有关秦始皇陵园的选址,有人

认为是受礼制和依山建陵的习俗的影响^[6];有人认为是为了满足其祖母夏太后“东望吾子,西望其夫”^[7]的意愿所定^[8];有人认为秦始皇只是随先祖葬在了骊山山麓^[9];有人认为秦王嬴政看到骊山好像一朵莲花,于是把陵址选在莲花花蕊中心^[10];有人认为秦始皇陵址与古龙文化有密切关系^[11];也有民间流传秦始皇陵园是根据古代风水学而选的陵址,是一块风水宝地……。上述观点有些仅在文中提出,有些仅是从某一个方面进行论述,有些仅是一种臆断猜想。为了全面了解秦始皇陵园的选址问题,笔者试从以下几个方面作一探讨。不足之处,请不吝赐教。

(一)秦始皇陵园的选址受礼制文化的影响

我国最早关于“礼制”的记载便是成书于战国时期的《周礼》。它不仅是社会生活中的制约性规定和仪式,还包括国家政治制度在内。秦人勃兴于西周王畿故地,受周文化影响较大,就礼制而言,秦承周制。但秦人并不是全盘吸收周礼,而是有针对性地继承并加以发展。特别是商鞅变法以后,秦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都进行了一系列变革,这种不循礼制的思想在变法中也体现得较为突出。如“礼者,所以便事也。”^[12]“因事而制礼”^[13]“三代不同礼而亡”,“贤者更礼而不肖者拘焉”“不易礼而亡”



图一 秦芷阳陵区平面示意图

^[14]等等,都表达了这层意思。秦人在承袭周礼的基础上,通过大胆变革,形成了一套适合秦人自身发展的礼制文化。即使秦统一后,秦人的礼制文化还在不断地改革。《史记·礼书》载:“至秦有天下,悉内(纳)六国礼仪,采择其善,虽不合圣意,其尊君抑臣,朝廷济济,依古以来。”

因此,秦始皇陵园的位置应该受秦人礼制文化的约束,并遵从一定的礼制制度来进行选择的。有学者认为:“秦始皇陵园的选址受当时礼制文化的影响,它选址于芷阳陵区的东边,符合了长辈居西、晚辈居东的礼制制度。”^[15]关于这种观点文献中有类似记载。《礼记·曲礼上》“南向北向、西方为上”、“为人子者,居不主奥”。郑玄注:“谓与父同宫者也。不敢当其尊处,室中西南隅谓之奥”。《尔雅》“西南隅谓之奥,尊之长处也。不西益者难(一作恐)动摇之耳。”可见以西方为上,以西南隅作尊长之处,是当时流行的习俗。汉承秦制,成书于东汉时期的《风俗通义》“宅不西益。俗说西者为上,上益宅者,妨家长也。原其所以西者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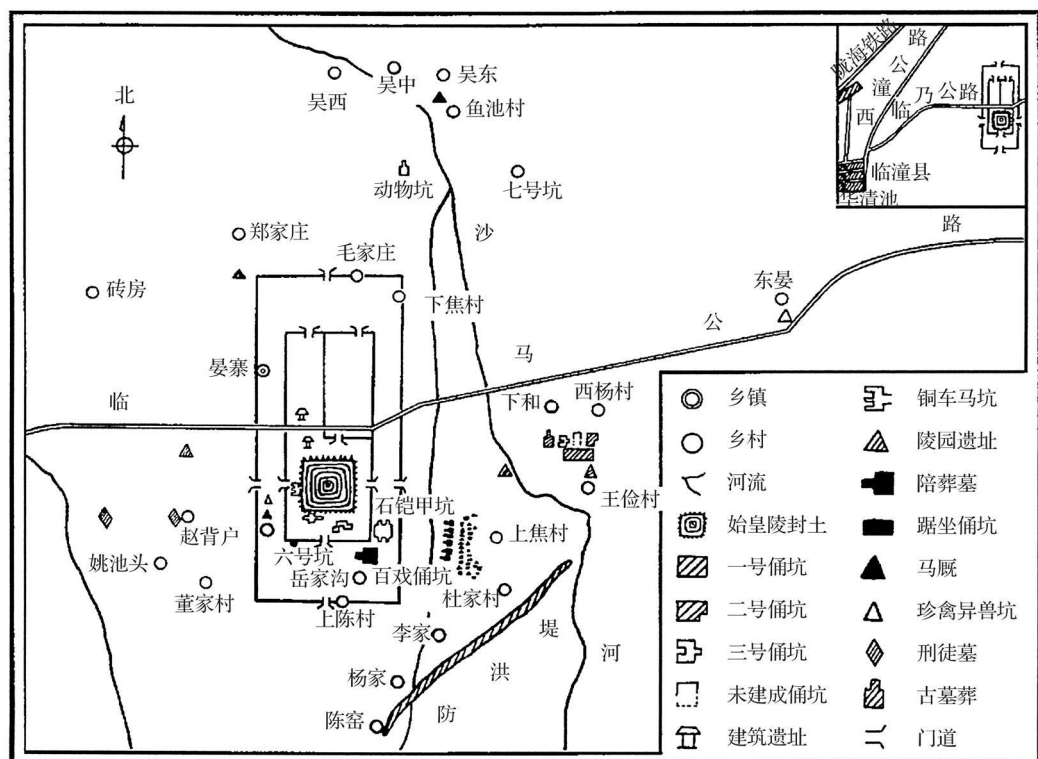
可见,战国至秦汉时期,人们日常生活中是以西方为上的,而秦始皇陵园的营造是按照“事

死如是生”的理念建造的,那么,陵园的选址也是应该遵循现实生活中的相关礼制仪俗。从嬴政以前的先公先王的陵址来看,基本都是遵从了“长辈居西、晚辈居东”的礼制习俗。

(二)秦始皇陵园的选址受秦人东扩趋势的影响

秦始皇陵园的选址与秦人自身的发展脉络有关系。纵观秦王嬴政以前诸位君王的陵园布局也不难看出这种陵园选址的方式。据史籍记载,秦自襄公立国,至二世亡秦,传三十二代,历563年。在此期间,秦人至少营筑了西垂、雍城、毕陌、芷阳与骊山五大茔域。除西垂而外,后四处茔地均可确指^[16]。西垂在今甘肃西和、礼县一带,葬襄公、文公父子。雍城在今陕西凤翔县,葬德公至出公等二十位国君。毕陌位于今陕西咸阳东北,葬秦惠文王与秦武王。芷阳位于今陕西临潼西的骊山山麓,葬昭襄王、庄襄王、孝文王、宣太后等。而骊山陵园也就是秦始皇陵园位于今陕西临潼东的骊山山麓。

古代都城附近都有聚族而葬的墓地。商周时期墓地一般建造在城外。春秋战国时期的诸侯国则多半把墓地迁入城内,无论是哪一种



图二 秦始皇陵园平面示意图

都表明墓地作为城市的主要部分,是被纳入城建的总体规划之中的。秦人也不例外,但他把陵墓安排在近郊,同宫殿区、手工业作坊区、商业区、居民区严格分离,却是都城布局上一个显著的特点^[17]。

从西垂、雍城、毕陌、芷阳陵园的地理位置来看,秦陵选址是由西向东逐步发展。这个发展趋势实际上也是秦人从地处西垂一隅之地的诸侯小国越过陇山沿渭河两岸逐步向东扩展的趋势。在东扩的过程中,秦人的国都也由西垂迁至雍城,由雍城迁至栎阳,再由栎阳迁至咸阳。秦国国君陵园也随着秦人势力的不断扩张,都城的迁徙,始终作为都城建设的一部分建于都城附近。从上述四个陵园的地理位置来看,它是由西向东,时代越晚的国君陵园的位置越向东,发展轨迹非常清晰。秦王嬴政即位之时,秦国已是诸侯强国,秦人的发展目标已经非常明确,那就是继续向东扩展,消灭六国,统一天下。因此,秦人的发展趋势和先公先王四大陵园的地理位置就决定了秦始皇陵园位置的选择只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选在芷阳陵区与先祖葬在一起 另一

种可能就是重新选址,营建新的陵区。因此,按照先公先王的遗风,按照西垂、雍城、毕陌、芷阳四大陵园的地域趋势及秦人不断东扩趋势,秦始皇陵园的选址在大的地理位置上只能向东,但是,不能远离国都,因为从东周诸国及秦以后的两汉时期的帝王陵园的地理位置来看,陵园基本都在都城附近,这样便于后人管理、保护与祭祀。从现在的秦始皇陵的地理位置来看,陵园距当时的国都咸阳也不过 50 公里。距芷阳陵区也仅 10 公里左右。

(三) 秦始皇陵园的选址受秦国国力的影响。

战国末年,秦国经过数百年的发展已成为诸侯强国。《史记·秦本纪》“惠王卒,子武王立。韩、魏、齐、楚、越皆宾从。”、“武王谓甘茂曰:“寡人欲容车通三川,窥周室,死不恨矣。”“昭襄王十七年,城阳君入朝,及东周君来朝。”《史记·高祖本纪》“秦富天下十倍”,《战国策·秦策一》云:秦“道不拾遗,民不妄取,兵革大治。”《史记·商君列传》云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 乡邑大治”秦王嬴政即位时期“秦

已并巴、蜀、汉中,越宛有郢,置南郡矣;北收上郡以东,有河东、太原、上党郡;东至荥阳,灭二周,置三川郡。”^[18]秦国已成为拥有“带甲百余万,车千乘,骑万匹”的军事大国。“秦马之良,戎兵之众,探前蹶后蹄间三寻腾者,不可胜数”^[19]。军事力量的发展、国力的强盛,促使秦人的心态也在发生微妙的变化。战国晚期的秦国不再是“诸侯鄙秦、丑莫大焉。”^[20]而是踌躇满志、意气风发,非常自信。这种变化从芷阳陵区的墓葬形制就可以看出,芷阳陵区既有中字形,又有亚字形,其中的亚字形是在中字形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亚字形墓即四出墓道,是天子一级的墓葬,说明战国后期的秦昭王时代开始使用天子的陵制了,到惠文王时期居然周天子也向秦国国君致文武之胙。可见秦国在当时人的心中具有何等的重要地位。秦人使用亚字形墓是当时政治、军事形势在陵墓制度中的反映^[21]。

国家的富强是可以影响人们的思想意识,可以促使上层建筑发生重大变化,也可以支撑决策者做出超乎寻常的决断。秦国国力的日渐强盛,不仅使国君的思想发生着变化,而且也深深地影响着他的王公贵族和子民们。因此,国君才敢冲破常规对沿用多年的礼制做出重大的变革,才敢使用象征着天子一级的亚字形陵墓……。这些僭越礼制的举措,也不是说任何人都可以做得到的,而是必须有强大的基础作为后盾。

由此来看,战国末年,秦王嬴政的陵园不可能完全遵照先公先王陵园的礼制习俗来营建,因为在芷阳陵区已经出现僭越礼制文化的现象,按照嬴政即位之初,秦国当年的政治、军事、文化、经济的发展水平及秦国在其它诸侯国中的声望来看,秦王嬴政陵园在最初的设计规划时,有可能就是按照天子的陵园来规划的,那么,其陵园在选址时,脱离芷阳陵区就不难理解了。这种现象类似秦人国都的迁徙,最初的国都在西垂,随着经济的发展、国土的扩张、国力的强大,原来的国都已经不适应或者已经不能承载国家的政治、文化中心,于是国都便由西垂相继迁至雍城、栎阳、咸阳。国君陵园作为国家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它的选址布局、营建规模均与国家的兴衰有息息相关的关系。

(四) 秦始皇陵园的选址受厚葬之风的影响

春秋战国时期,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葬俗葬仪也在发生着变化。开始在墓上修筑坟丘,种植树木。战国末年,厚葬风习更加盛行。

《墨子·节葬下》“棺槨必重,葬埋必厚,衣裳必多,丘垅必巨”。

《礼记·月令》“营丘垅之大小、高平,厚薄之度,贵贱之等级。”

《汉书·楚元王传》引刘向曰:“及秦惠文、武、昭、孝文、严(庄)襄五王,皆大作丘陇,多所瘞藏。”

秦简《法律答问》“可(何)谓甸人?守孝公、湫(献)公冢者殴(也)。”由此来看,此时秦国国君的墓已是有封土堆的冢墓,并设有专人守护。我们今天依然可以看到的位于今陕西咸阳东北毕陌陵区呈覆斗形的墓冢便是秦惠文王的公陵,高 11.8 米底边长 78 米顶边长 48 米。呈圆形的墓冢便是秦武王的永陵,高 12.3 米底边长 78 米^[22]。考古资料证明,在芷阳陵区中,一号陵园的两座亚字形大墓的墓顶上有封土堆,残高 4 米东西长 250 米南北宽 150 米,表面呈鱼脊形。二号陵园发现大墓 4 座,其上残留有 2~10 米不等的封土。三号陵园有中字形大墓 1 座,封土残高 5 米。四号陵园共发现大墓三座,亚字形大墓 M8 的地面封土已破坏,两座甲字形墓上的封土,一座残高 3 米,另一座残高约 6 米^[23]。

战国时期君王的陵墓不仅仅出现愈来愈高大的封土,而且随葬之物也越来越丰厚,这样有限的主墓室就难以容纳这些随葬品,主墓旁各类陪葬坑的数量也逐渐递增,陵园的墓上建筑也在不断丰富,因此,陵园的面积也在相应的不断扩大。

秦王嬴政即位之初,秦国国力日渐强盛,厚葬之风也愈演愈烈,这些因素导致了秦王嬴政的陵墓在最初的设计规划时,其范围应该超过前代国君。那么,芷阳陵区处于一个有限的高台地之上,从目前考古勘探资料来看,芷阳陵区为 150 万平方米,而秦始皇陵区为 56.25 平方公里(5625 万平方米),相当于整个芷阳陵区的 37.5 倍。当然 56.25 平方公里的秦始皇陵区并不是最初的设计规模,而是在后来的修建过程中不断扩大的,但是,最初的设计规模应该是不会小的,因此当时的芷阳陵区是否有足够的区域容纳新

的陵园,是值得考虑的问题。

《吕氏春秋·节丧》“故凡葬必于高陵之上,以避狐狸之患、水泉之湿。”从历代出现封土的国君陵墓选址来看,一般均选在地势较高的地方,原因有二:一是为了显示其威严,高高在上、便于后人祭拜;二是为了防止洪水冲刷。因此,秦王嬴政的陵园在选址过程中,为了通过高大的墓冢、宏大的陵园向后人显示君王至高无上、唯我独尊的权威,显示国家的威严、国力的强盛,不可能将陵园选在一个低洼地带,而应该是在芷阳陵区没有合适地方容纳的情况下,遵从先公先王有关陵园建设的礼制文化,顺着骊山山脉,将陵园选在芷阳陵区以东的高台地上,即现在的位置。

(五)秦始皇陵园的选址受丞相吕不韦的影响

《汉旧仪》“始皇‘使丞相斯将天下刑人徒隶笨十二万人作陵。凿以章程,三十七岁,锢水泉绝之,塞以文石,致其丹漆,深极不可入。奏之曰:‘丞相斯昧死言:臣所将隶徒七十二万人,治骊山者已深已极,凿之不入,烧之不然,叩之空空,如下天状。’制曰:‘凿之不入,烧之不然,其旁行三百丈乃止’”。由此来看,此时陵园的修建工程由丞相李斯负责。其实关于丞相(或称相邦)负责修建国君陵墓亦有先例。如1978年河北中山国王陵出土的铜版兆域图上的铭文说,国君命相邦“为兆乏(法)”^[24]。

依此来推断,秦王嬴政的陵园选址与早期修建应由相邦吕不韦负责。《史记·秦始皇本纪》“王年少,初即位,委国事大臣。”从秦王嬴政即位至亲政的十年间,吕不韦权倾朝野,不可一世,是秦国真正的主事者。那么,象国君陵园选址、规划、修建这种国之大事,相邦吕不韦应该有很大的决断权。值得说明的是,由丞相吕不韦主持编写的《吕氏春秋》也多次提到有关厚葬之风,如:《吕氏春秋·安死》“世之为丘垄也,其高大若山,其树之若林。”《吕氏春秋·节丧》“国弥大,家弥富,葬弥厚。”也正是这种厚葬之风的影响,加之芷阳陵区可延展性很小,才促使相邦吕不韦在为秦王嬴政选择陵址时,独辟蹊径、沿着骊山山麓向东扩展。这种现象也正如王学理认为“秦王嬴政即位后 面对秦国统 天下

的形势,商人出身的相邦吕不韦,在对君主选择茔域上,同样表现出他的远见卓识。遵照古人生前建陵墓的习惯和秦人先公先王的传统,嬴政在即秦王位不久就开始了自己的陵墓工程。主事的吕不韦大概认为芷阳的先王陵区不足以显示将来统驭天下君主的威仪,这就产生了脱离先王东陵茔域的构想,最终选择了骊山北麓。”^[25]

可见,秦始皇陵园最初的选址在很大程度上受吕不韦的影响,当然,现在看到的秦始皇陵应是秦王嬴政亲政后,随着统一大业的逐渐实现帝王私欲的日渐膨胀最终修订的结果,但陵园最初的位置还是体现吕不韦的思想较多。

(六)秦始皇陵园的选址受早期风水学的影响

两千多年后的今天,当我们俯视秦始皇陵,可见陵南正对骊山主峰,山势崇峻连亘,宛若屏障,陵北为渭河平原,极目苍茫,旷达豁然,由此会感叹秦始皇真伟大,就连他葬身之地也会选这样一个风水宝地。其实,那时候并没有“风水”一说,真正的“风水学”出现于魏晋时期。“风水”二字源于晋代郭璞著《葬经》中:“气乘风则散,界水则至;故人居之使不散,行之使有之,故谓之风水。”

风水学的名词,自古众多。有堪舆、青囊、青鸟、宅、相宅、图宅、形阔、阴阳术、地学、甲相学之称。演变大致经历了先秦孕育时期、秦汉萌芽时期、魏晋发扬时期、唐宋成熟盛行时期、元代低落时期、明清流传繁荣时期^[26]。早在先秦就有相宅活动。《尚书》中有:“成王在丰,欲宅邑,使召公先相宅。”《淮南子》中有:“堪,天道也;舆,地道也。”堪即天,舆即地,堪舆学是以河图洛书为基础,结合八卦九星和阴阳五行的生克制化,把天道运行、地气流转以及人完整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一套特殊的理论体系,从而推断或改变人的吉凶祸福,寿夭穷通。《黄帝内经》曰:“气者,人之根本;宅者,阴阳之枢纽,人伦之轨模,顺之则亨,逆之则否。”《易经》曰:“星宿带动天气,山川带动地气,天气为阳,地气为阴,阴阳交泰,天地氤氲,万物滋生。”

关于风水学的含义,罗哲文曾指出:“风水学实质上是基于农耕文明的文化,缘起于‘大地为母’以‘天人合’的思想为最基本的哲学内

涵,提倡人的一切活动要顺应自然的发展。其宗旨是审慎周密的考察、了解自然环境、顺应自然,有节制的利用和调谐自然,应在良好的人类生存和发展环境,获得最佳的天时、地利与人和,达到‘天人合一’的至善境界。”^[27]

北魏时期的酈道元在《水经注》中说:“秦始皇大兴厚葬,营建冢圻于骊戎之山,一名蓝田,其阴多金,其阳多美玉,始皇贪其美名,因而葬焉。”按他的说法,秦始皇是因贪图这里的黄金与美玉而将自己的陵园选择在此。酈道元这样解释秦始皇陵园,可能与当时的风水学有很大的关系。

秦王嬴政即位之初,系统的风水学虽然还没有产生,仅是孕育时期,但是,此时的秦人在为国君选择陵址时,也会为国君选择一个环境优雅、舒适安逸的安息之处,因为国君的陵园不仅是为了安葬国君而修建,它已经被赋予浓厚的政治色彩,国家每年一些重大祭祀、礼仪活动都要在君王的陵园进行。这种情况在嬴政称帝后表现得更为突出,他将在宗庙里进行祭祀祖先活动的一部分内容转移到陵墓旁,在陵墓之侧修建宫殿,专设祭祀,使后人常记不忘。《独断》上记载:“古不墓祭,至秦始皇出寝,起之于墓侧。汉因而弗改。陵上称寝殿,有起居、衣冠,象生之备,皆古寝之意也。”因此,秦人在为嬴政选择陵址时,也许借助了堪輿学理论,也许他们这种选择陵园的基本思想正好迎合了后来风水学中关于选择居址的一些基本原则。如罗哲文所说,“风水学的核心内容是人们对居住、生存环境进行选址和处理的一种学问,选择能在人们生理上和心理上产生良好信息的地理环境条件。”^[28]于是,秦始皇陵园选择在这样一个依山傍水的地区也是不难理解的。袁仲一认为:“古人把陵墓一般选在地势较高、环境优美之处。始皇陵南依骊山,山林葱郁,谷峰相间,在陵南略作弧形展布,似盛开的莲花,始皇陵像似莲蕊。陵北面临渭河,渭河横贯关中平原,至此处逶迤曲转,似银蛇横卧。形势之美,环境之秀,为关中之冠,确是比较理想的陵园所在地。”^[29]

《永乐大典》卷 8199 引《大汉原陵秘藏经》中的《选坟地法篇》:“立塚安坟,须藉来山去水。”《辨风水法篇》:“凡好山不如好水,一丈之

岗,不如一尺之水”。秦始皇陵园在选址时,应该是很好地利用了骊山与渭水的地理位置及堪輿学的理念。其实,这种依山傍水选择陵址的现象在秦先公先王的陵园中已有先例,譬如,西垂陵区已探明的大堡子山秦公陵园就是依大堡子山、临西汉水,位于高台地之上。芷阳陵区背依骊山、面临灞水,也是位于高台地之上。想必这种现象可能也与早期风水学有千丝万缕的关联。

综上所述,秦人的礼仪制度与秦人东扩确定了秦始皇陵园的选址在大的方位上只能是趋于东方,秦国国力的发展壮大与厚葬之风的盛行则决定了秦始皇陵园可能要脱离芷阳陵区,出现“一冢独尊”的现象,而相邦吕不韦的思想与堪輿学即还处于孕育期的早期风水学的思想理念可能决定了秦始皇陵园陵址的具体位置。由此可见,秦始皇陵园的选址是上述因素综合影响的产物,但在诸因素中,笔者认为,相邦吕不韦的思想是影响陵园选址最重要的因素。因为,秦人的礼仪制度、秦人东扩、国力壮大及堪輿学等因素在秦先公先王陵园的选址中或多或少的有所体现,这些因素更多地体现了陵园选址的客观性,基本不是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而相邦吕不韦在秦始皇陵园选址过程中更多体现的是主观性,这种主观因素在秦始皇陵园的选址问题中更加彰显了它的独特性。从“王年少,初即位,委国事大臣”的史料中可以看出,初即位的秦王嬴政还是一个年仅十三岁的少年,对于涉及到陵园选址这样的国之大事不可能有更大的决断权,此类重任只能落到当时主持国事的相邦吕不韦的肩上。因此,秦始皇陵园的选址是相邦吕不韦在遵从影响陵园选址的诸多客观因素的前提下完成的,选址过程中体现相邦吕不韦的思想居多。

总之,秦始皇陵园的选址、营建是秦人社会上层建筑的一部分,是国家权力象征与延续的一种表现形式。通过对秦始皇陵园选址相关问题的分析,不仅可以反映秦人陵墓制度的变化,而且也可以反映秦人思想观念、精神风貌等层面的一些内容,对进一步研究秦人的历史文化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附记:本文承蒙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焦南峰研究员的悉心指导,谨致谢忱!

(下转 72 页)

[4] 张家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 张家山汉墓竹简 (二四七号墓) [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01: 149 159

[5] 中国文物研究所,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敦煌悬泉汉简释粹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 192 193

[6] 同注 [1]: 920

[7] 同注 [1]: 923

[8] 同注 [1]: 1026

[9] 肖子显. 南齐书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3: 835- 836

[10] 《晋书》是 620条,《隋书》是 1530条,《通典》是 20篇 630条,《唐律疏议》是 28篇 620条。

[11] “救”字的写法,或以为: a “‘掾’,帛书本作‘救’,毛诗作‘掾’。字皆从‘求’得声,故可互用。”文见廖名春. 楚简〈五行〉篇〈诗〉说〈诗〉考 [C]// 追寻中华古代文明的踪迹——李学勤先生学术活动五十年纪念文集.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2 64 b “掾,古救字。”班固. 汉书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3 3998 颜师古注.

[12] 饶宗颐. 敦煌所出北魏写本《国语·周语》旧注残页跋 [C] // 敦煌吐鲁番研究.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6 297- 300. 有附图可供参考。

[13] 周祖谟. 记吐鲁番出土急就篇注 [C]// 敦煌吐鲁番文献研

究论集 (2).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3 178- 189.

[14] 谢桂华. 居延汉简释文合校 [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87.

[15]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 居延新简 [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90: 202- 207

[16] 甘肃省博物馆. 武威磨嘴子出土王杖十简释文 [J]. 考古, 1960(9).

[17] a 曹怀玉. 谈居延汉简中“ = ”号的用法 [J]. 甘肃师范大学学报, 1978(1). b 韩文发. 也谈“ = ”号的用法 [J]. 甘肃师范大学学报, 1978(3). c 马先醒. 简牍文书之版式与标点符号 [J]. 简牍学报, 1980(7). d 高大伦. 释简牍文书中的几种符号 [C]// 秦汉简牍论文集. 兰州: 甘肃人民出版社, 1989.

[18]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居延汉简甲乙编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0: 图版甲 2361

[19] 左景权. 敦煌古图书蠡测 [C] // 敦煌学百年文库: 文献卷 2 兰州: 甘肃文化出版社, 1999 510

(责任编辑 宋远茹)

(上接 55页)

[1]班 固. 汉书· 楚元王传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2

[2] 周易正义卷八孔颖达疏: “不封不树者, 不积土为坟, 是不封也; 不种树以标其处, 是不树也。”孔颖达. 周易正义 [M]. 北京: 九州出版社, 2004.

[3] 司马迁. 史记· 赵世家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2

[4] 杨宽. 秦始皇陵园布局结构的探讨 [J]. 文博, 1984(3): 11.

[5] 司马迁. 史记· 秦始皇本纪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2

[6] 张占民. 秦始皇陵园渊源试探 [J]. 文博, 1990(5): 167- 168

[7] 司马迁. 史记· 吕不韦列传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2

[8] 郭兴文. 关于秦始皇陵建造的三个问题 [J]. 文博, 1990 (5): 191- 192

[9] 马振智. 试论秦国陵寝制度的形成发展及其特点 [J]. 考古与文物, 1989(5): 113

[10] 牛一民, 牛晓. 骊山今古与诗选 [M]. 西安: 陕西旅游出版社, 1993: 10- 11

[11] 三笑, 雒恒兴. 秦始皇陵址奥秘有新说 千古一帝寝卧巨龙之首 [N]. 西安晚报, 1994- 7- 26

[12] 商鞅. 商君书· 更法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13]同 [12].

[14]同 [12].

[15]同 [6].

[16] 王学理, 尚志儒, 呼林贵等. 秦物质文化史 [M]. 西安: 三秦出版社, 1994: 254- 255

[17] 王学理. 咸阳帝都记 [M]. 西安: 三秦出版社, 1999: 219

[18] 同 [5].

[19] 刘向. 战国策· 韩策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5

[20] 司马迁. 史记· 秦本纪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2

[21] 同 [16]: 297

[22] 咸阳市文物事业管理局. 咸阳文物志 [M]. 西安: 三秦出版社, 2008: 64.

[23] 同 [16]: 275- 278.

[24] 河北省文物管理处. 河北省平山县战国时代中山国墓葬发掘简报 [J]. 文物, 1979(1): 5, 10

[25] 同 [17]: 235

[26] 肖一亭. 风水学形成源流及发展资源与人居环境 [J]. 2005(7): 34- 35.

[27] 罗哲文, 骆中钊. 风水学与中国古代建筑的规划营造 [J]. 古建园林技术, 2008(2): 10- 16.

[28] 同 [27].

[29] 袁仲一. 秦始皇陵兵马俑研究 [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90 7.

(责任编辑 宋远茹)